

文章编号: 1673-1646(2014)01-0078-05

从创伤理论角度解析《第五屠宰场》中的主人公形象塑造

颜凡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代表作《第五屠宰场》是作者以自己在战争中的真实经历为题材的反战小说,小说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战斗英雄,也没有美好品性的基督教徒似的人物。在创伤理论的关照下,小说的众多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比利以及兼具作者和叙述者双重身份的库尔特都表现出亦真亦幻的特征。冯内古特的创作过程是再现创伤的过程,努力克服创伤的同时又必须接受创伤。这种独特的创伤写作艺术,揭露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印证小说的反战主题。

关键词: 《第五屠宰场》; 创伤理论; 主人公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14.01.017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in *Slaughterhouse-F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YAN Fanb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Kurt Vonnegut's representative work *Slaughterhouse-Five* is an anti-war novel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in World War II. There is not a single conventionally militant hero or a Christian character 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most characters including Billy Pilgrim,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 Kurt Vonnegut, the author and narrator, show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real or deformed. Vonnegut's writing process was one of reappearance of the trauma. He strived to overcome the trauma, and to accept it at the same time. This unique traumatic writing revealed the dramatic harm that the war brought to people, confirming the theme of anti-war.

Key words: *Slaughterhouse-Five*; trauma theory;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agonist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涌现出的一位后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著名的黑色幽默派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第五屠宰场》无论从语言风格、小说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甚至从轰动效应上来看,都是一部非凡的杰作。^[1]许多评论家对其后现代特征以及叙事手法和黑色幽默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阐述,但关注作者创伤写作背景的却很少。本文以创伤理论为研究视角,对《第五屠宰场》中的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创伤写作艺术进行分析,并揭露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以印证小说的反战主题。

1 现代创伤理论在小说中的应用

“创伤(Trauma)”一词来源于希腊文“Traumatize”,意指身体表皮被刺破或局部剥落。^[2]随着医学的发展,该词由物理创伤扩展到精神层面的损害。19 世纪末,法国医学家马丁·夏柯通过对大量患有精神错乱的女性进行调查分析,首次提出心理创伤会使人导致歇斯底里病症的观点;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精神病医生亚伯拉罕·卡丁娜对一战、二战中遭受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进行了系统化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卡西·卡鲁斯针对家庭暴力

*收稿日期: 2013-10-28

作者简介: 颜凡博(1979-),女,讲师,硕士,从事专业: 英语教学。

进一步扩展了创伤理论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凯罗林·格兰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创伤与精神结构关系。

2004年,安娜·怀特海德首次将“创伤小说”概念从医学领域迁移至文学研究,并给出详细定义及小说鉴定范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著作《创伤小说》。《创伤小说:集体灾难的当代象征性描述》的作者罗纳德·格兰诺夫斯基注意到:二战以来,文学变成了联系虚构世界中心的个体创伤与人性内心恐惧的纽带。

格兰诺夫斯基对“创伤小说”做了补充说明,即“创伤小说有别于现代小说之处在于,创伤小说是通过个体对创伤体验的文学象征手法进行探究的过程。这些创伤要么来自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情,要么来自现在存在的危机,或者来自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想象的恐惧。”^{[3]10} 创伤理论的出现为小说家提供了新的定义创伤的办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记住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转移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被记住”,这引起了人们对相关的政治、道德以及审美问题的重视。因此,不同的文化团体便产生了去表现或展示一些具体的历史性创伤事件的想法,现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像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的《移民》和《奥斯特利兹》,小说与德国空袭有关,还有托尼·莫里森的《爱人》和《爵士乐》,这两部是关于奴隶制期间普通黑人和之后的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政治上认可的作品。乔纳森·萨福兰·福尔的《极吵,极近》着力表征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平民百姓所蒙受的精神创伤。

人们遭遇创伤以后,会在心理上产生很重的负担,为了让别人能够理解这种创伤,往往构建一种叙事,即故事,并把它讲述出来。“只有当受创伤者能够表述及传达故事,真实地将故事传递给其他人,再收回为内在时,才真正生效。”^{[4]117} 正如《第五屠宰场》的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残忍,战争经历给作者带来的是无法磨灭的心理创伤,因为战争记忆在他心中压抑了二十年之久。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谈到心理创伤时强调“受到创伤的人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刺激通常会释放一种对抗刺激的特殊封套或薄膜,即自我保护系统,避免回忆创伤记忆带来的巨大伤害。”^{[5]34} 现代心理学家施琪嘉也在其著作《创伤心理学》中提到“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的存储位置不同,它只存储于大脑的某个特定区域。因此受创个体的回忆只停留在记忆表层,也就是所谓的暂时性失

忆。”^{[6]102} 在战争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冯内古特对战争经历出现了暂时失忆的现象,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然而暂时性的失忆不代表永远的忘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他创作《第五屠宰场》就是“治疗性的东西”^[7],为的是让自己走出创伤阴影。笔者认为冯内古特的创作过程其实是再现创伤的过程,在小说中以创伤者的视角将创伤经历叙述出来,向公众展示战争的残酷,进而调整自己的状态,并以此来内化创伤记忆,在接受创伤的同时,努力克服战争记忆带来的创伤。

小说以冯内古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在童年遭受多次心理及身体创伤,成人之后又经历战争创伤的主人公比利。经受多次创伤的比利不堪重负,最后精神崩溃,导致他在自己的幻觉中不停地穿梭时空,可见创伤性体验在他身上发挥出强大的摧毁性力量,并将他带入自我幻想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

2 《第五屠宰场》的创伤背景

小说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冯内古特的双重身份,他既是战犯又是小说情节的叙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冯内古特只有十六岁,他二十岁应征入伍,被送往欧洲战场。1944年12月22日,被德军俘虏,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经历了让他一生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德累斯顿轰炸事件。作者说“我当时就在大屠杀的现场。”^{[8]34} 当冯内古特和其他年轻士兵进入欧洲战场时,他们还坚信他们的政府是尊重生命的,不会伤害无辜百姓。事实上,德累斯顿是一个没有战略价值的城市,但在1945年2月13日,英美两国的重磅轰炸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冯内古特和几名俘虏因为被囚禁在一个荒废的屠宰场的地下室而幸免于难,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冯内古特的任务就是负责焚烧遇难平民的尸体,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最初对战争的态度,迫使他通过写作来表达战争的本质。任何正义的借口都无法为英美政府的罪行开脱,这样出人意料的经历为作者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英美政府妄想掩盖事实真相,而当局也对此事避而不谈,导致国内很少人知道。距德累斯顿被毁二十多年之后,冯内古特终于鼓起勇气将这段伤痛的记忆付诸笔端。从有创作想法到开始构思,到小说的最后完成创作,作者重温了这一段极为痛苦的经历。可见,作者的创伤背景也是小说的创伤背景。

2.1 冯内古特的双重身份

冯内古特也是小说情节的叙述者,他已经预先知道故事情节发展的每一步,故他在小说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以何种方式去理解这部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这样写道“所有的这些或多或少都发生了。”^{[9]1}一方面,冯内古特称小说中的事情不是捏造的,另一方面,“或多或少”意味着故事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小说第一章中,冯内古特以写传记的形式描写他的战后生活。“我是一个带着他的记忆的老家伙。他就是我的老战友,贝赫纳德。”^{[9]13}冯内古特有一个老朋友,当时和他一同去了欧洲战场,在接下来的几章中,冯内古特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就隐藏起来,在后来的场景中只出现了几次,当谈到比利的战争经历时,冯内古特插了一句“我就在那儿”^{[9]11}。这种作者口吻的声音一直存在到故事结尾。

作为叙述者,冯内古特不仅从个人角度生动地描述了他参加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以他独特的身份告诉读者他写这部小说之前和写作期间的挣扎,还有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有双重身份,他既是战犯,又是叙述者,且目睹了二战中的德累斯顿轰炸。然而作为叙述者却用一种冷漠而超然的姿态去描述这样悲壮的历史事实和比利的遭遇,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流离感。冯内古特的双重身份增加了小说的视角,虽然作为战犯的冯内古特和作为叙述者的冯内古特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2.2 《第五屠宰场》中的反英雄形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都是神之子,人中龙,那些英雄人物要么是神的后裔,天之骄子,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宠儿,要么就是具备凡人所羡慕的一切,坐霸一方,王统天下,是凡人中的俊杰。”^[10]这些英雄人物,会在危险和逆境面前表现出勇于牺牲自我的坚强意志,也就是英雄主义。^{[11]5}“反英雄形象”是对现代文学中塑造的一个新形象的总结。这种小说里没有“反面人物”或“反面角色”,主人公是生活中最为痛苦的生命,他们普通、卑微、琐碎、胆小、被动、优柔寡断,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12]

《第五屠宰场》不是一部美化战争的小说,而是一部反战小说,主要反映了战争的荒唐和残暴。所以小说并没有描写战争英雄的壮举,而是描写了一群

胆怯的男青年如何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愚蠢的角色构成了一个愚蠢的世界,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什么鲜明的性格特点,故事情节也没有强烈的冲突,“因为所有的人都病殃殃的,他们都是军队手中的玩物罢了”^{[9]79}。

冯内古特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并没有去创造一些光辉的英雄形象来美化战争。比利是小说中主要的反英雄形象,在军队的控制下,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在进入大学三个月之后,他便被送往欧洲战场。比利是随军牧师的助手,所以他从来没拿过枪。比利在小说中的滑稽造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高的个子,但是很虚弱,整个形状就像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9]16}。当德军在河边射击比利和韦瑞时,一颗子弹与比利擦肩而过,比利礼貌地站在那里,准备再给射手一次机会。^{[9]19}比利竟然愚蠢地认为应该再给射手一次机会,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一名士兵。小说中有两个真正称得上战士的人,他们是很有才干、训练有素的侦查员,但却被德军杀害。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比利手脚不灵活,身体又虚弱,最终成为战俘,却幸免于难。这和两名侦查员形成鲜明对比。比利和其他美国战俘被转移到德累斯顿,因为他们的藏身之所比较安全,所以又幸运地躲过了德累斯顿的轰炸。五月,俄军接手该地区,比利等人被遣返回国。

综上所述,作者故意将比利塑造成一个软弱、无能而且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这样的反英雄形象表面看很有喜剧效果,但作者要表现的悲剧主题却是严肃的。作者以喜剧中蕴含着悲剧的形式,刻意不去直接描写战争的野蛮和残忍,反而使战争显得更加残忍和严峻。初读小说的读者会经常大笑,但笑声过后就会意识到,这些搞笑的素材都是源自作者自己真实的战争经历以及在德累斯顿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真切体会。

3 创伤理论在《第五屠宰场》主人公形象塑造中的体现

3.1 童年比利的创伤

主人公比利出现在小说第二章中,他可以随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空穿梭,有趣的是,比利每说一句话,后面都会跟上一句“he says”(意思为“他说”,这里动词使用的时态是现在一般时,表示经常发生的动作或经常存在的状态)^{[13]176}。动词“say”在

这里使用的时态暗示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比利是真的可以穿梭时空还是他以为自己可以穿梭时空呢?这些情节是真实存在还是作者虚构的呢?这个问题就留给读者去思考和回答了。

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提到比利的童年遭遇过三次创伤。第一次是在比利的童年时期,他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基督十字架的虐待和伤害。比利不是基督教徒,但墙上却总有一个恐怖的十字架陪伴着他。他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母亲是镇上几个教堂的替补风琴手,每次她演奏的时候都会带上比利,也会教比利一些演奏的方法,她还说等决定了哪个教堂比较好就会加入哪一个,但她最终也没有决定。不过她却非常热切的渴望得到一个十字架,所以在美国经济大萧条那段时间,比利全家去旅行时,她在一家礼品店买了一个十字架,像许多普通的美国人一样,也试图用在礼品店里买来的东西构筑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来到了比利的小卧室。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的苦像也许只有从医多年的外科医生才能崇拜和欣赏,可想而知,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要整日面对这样悲惨的苦像,他的内心一定被可怕的阴影笼罩着。

第二次是比利的父亲用直接将其扔进泳池的方式教比利学游泳。当父亲准备将比利扔进深水区的时候,年幼的比利感觉要被处以死刑一样,他感到恐惧、麻木,害怕到了极点,之后就丧失了知觉。父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碾碎了比利脆弱的神经,从此留下了一段令他毛骨悚然的记忆。

第三次是在克罗拉多大峡谷,比利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当比利时空穿梭回到了他12岁的童年时,他发现自己正和父亲母亲一起站在克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那是一个自杀者常去的地方,比利恨透了那个地方,他知道他就要跳下去了,但他的妈妈碰了比利一下,他就尿湿了裤子。

总之,比利的创伤与冯内古特在童年经历的创伤有紧密的联系。大萧条给周围经济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冯内古特母亲的死也给他后来的人生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所以冯内古特的小说大多是写和死亡、战争以及精神分裂相关的题材。

3.2 战后比利的分裂性人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创伤是惨重的。二战之后,许多人都陷入了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之中,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战争带来的创伤,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及行为变得很不正常,难怪从战争

中幸存的比利变得神经失常,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凯西指出:那些经历战争创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因人而异的,既有心理的,也有生理的,这些症状由跟创伤有关的内在或外在的信号引发,这些信号通常是具体的能感知的现象,比如与创伤事件的情境有联系的景象、声音、气味等。当创伤事件发生时,个体会面临一种和固有的信念和行为模式完全不一致的经历,所以对战后精神分裂症的疗法是让病人从心理上真正的接受所经历的创伤,以便使创伤经历能够融入幸存者的人生轨迹。关于创伤的最一般的概念是,“创伤描述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突然或灾难性事件,而且经历者对事件产生的反应常常是延后的,无法自控的重复出现幻觉以及其它的侵入性现象。”^{[14]8} 长时间的情绪低迷和精神崩溃,使比利的精神状态极度恶化,常常进入到一种不能自控的歇斯底里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比利还有精神分裂症最典型的症状,即他经常出现幻觉。这主要是因为比利为了回避现实而退缩到自己假象的世界当中,而当他在现实世界得不到满足时,就在幻觉中寻找慰藉,所有的愿望都能在那里实现。

精神错乱的比利在现实和他的虚幻世界中来回穿梭,仿佛所有的瞬间都是一直存在而且将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比利可以不受时间的束缚,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紧接着又从1941年的门出来,然后又出现在1963年的门口。比利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他多次经历自己的出生和死亡等重要的时刻。飞机失事之后,比利开始向人们讲述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经历,如被外星人绑架去了特拉玛法星球旅行了一圈。比利的女儿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飞机失事可能伤到了他的颅骨,导致脑子出现幻觉。比利也清楚地知道这些,但是他无法自控,经常在午夜或在他的婚礼上失控地哭泣,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枯燥的战后生活使他的精神状态更加恶化,最后完全崩溃。所有这些导致比利不得不在一种假想状态下时空穿梭,来释放长期以来集聚的心理压抑。

比利想抑制那些带给他创伤的记忆,但他却根本无法摆脱那些带给他伤痛过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不能对自己负责。无法控制的哭泣、阵发性嗜睡、幻觉,还有突然爆发的歇斯底里都是那些创伤给比利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个被战争吓出来的“反英雄”变成了逃避现实生活的灵魂出壳的生物,最终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时空穿梭、不明飞行物、特拉玛法星球这些比利常用的把戏是他自编自导的科幻小说,特拉玛法星球是比利想象中的伊甸园,在那里比利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慰藉。

悲惨的童年、亲人和朋友的死别、成为俘虏的痛苦、德累斯顿屠杀、不幸的婚姻,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在比利的脑海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也许再没有谁比他更悲惨了。

3.3 比利的自我疗伤

比利被他童年的噩梦和德累斯顿屠杀折磨得很痛苦,他拼命地想将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以摆脱不断折磨他的创伤记忆,最后比利只好用他虚构的特拉玛法星球来度过这段心理危机。在比利的幻想世界中,特拉玛法星球是一个距离地球几亿光年的星球,上面的居民是绿色的、貌似机器人一样的生物,他们的吸碗和地面连接,头上灵活的天线通常指向天空。

特拉玛法星球独特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让比利可以灵活地面对他世界里的不快乐和野蛮,并释放一直在严重摧残他神经的悲痛和恐惧。特拉玛法星球的人认为任何事都是注定的,这种宿命论特别适合比利的自我精神疗法。天生想象力丰富的比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梦想中的伊甸园,那是他的避难所,当现实残酷得让人难以忍受时,他就躲到那里去。那里没有战争和暴力,没有伤害,到处都是那么美。至少从精神层面来讲,特拉玛法星球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观念让比利学会了如何回避现实,得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据比利描述,特拉玛法星球的人绑架了他,将他赤身裸体地与蒙特娜一起关在动物园里面(蒙特娜是地球上一位知名的影星)。在那里,比利与蒙特娜互相理解而且深爱着对方。在蒙特娜的眼中,比利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和英雄。比利也愿意对蒙特娜坦露内心的战争创伤,这是他从未对自己妻子做过的事情。特拉玛法星球是他理想的伊甸园,在那里,现代的“亚当”和“夏娃”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远离地球的战争和死亡。

特拉玛法星球只不过是当内古特的一个幻想而已,是他让比利遗忘创伤的一种方式,也是作者为自己找到的一种缓解战争创伤的方式。比利的时空穿梭是典型的经历创伤之后的神经错乱,他可以在多个时空中随意穿梭,但这却是他可以甩掉战争创

伤的理想手段。总之,时空穿梭和理想中的伊甸园是主人公比利自我疗伤的成功疗法。

4 结 语

《第五屠宰场》以作者冯内古特本人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童年遭受多次心理及身体创伤,成人之后又经历战争创伤的主人公比利。本文以创伤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利用战争去塑造战斗英雄形象的常规模式,揭露了动荡年代普通、胆小、卑微、被动、优柔寡断的男青年如何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让读者从中深切体会到战争对个人及国家的伤害。

参考文献

- [1] 件从巨.《第五屠宰场》思想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 1995(3): 20-30.
- [2] Garland Caroline. Understanding Trauma: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M]. London: Duckworth, 1998.
- [3] Ronald Granofsky. The Trauma Novel: Contemporary Symbolic Depictions of Collective Disaster[M]. New York: Lang Publishing, 1995.
- [4] Felman Shoshana, Dori Laub. Testimony: Cri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5] [犹太]弗洛伊德. 超越快乐原则[G]//车文博,主编. 费洛伊德文集.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 [6] 施嘉琪. 创伤心理学[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6.
- [7] 林珍珍. 库尔特·冯尼格访问记[J]. 译林, 1983(3): 27-31.
- [8] Siber Sharen. Unstruck in Time: Simultaneity as a Foundation for Vonnegut's Chrono-Synclastic Infundibula and Other Nonlinear Time Structure[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0.
- [9]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五屠宰场[M]. 云彩, 紫芹,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10] 范雪莉, 陈顺利. 从中国和希腊神话英雄对比看中西方英雄观的不同[J]. 安徽文学, 2010(11): 54-55.
- [11] 李柏茹. 论“反英雄”及其文化特征[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7.
- [12] 赖干坚. 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J]. 当代外国文学, 1995(1): 145-147.
- [13] 薄冰. 薄冰英语语法[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999.
- [14]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